

# 山地丝绸之路:古代中国广西通向 东南亚的经贸之路

玉时阶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学术界认为,古丝绸之路主要有“西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事实上,除了以上四条丝绸之路外,历史上古代中国为加强和南方周边邻国的交通和经贸联系,还在借助南方水路交通的同时,不畏艰难险阻,劈山开路,开辟从广西通往东南亚的对外交通陆路,以增强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联系,并在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上开设贸易关口与市场,利用这条陆路通道与东南亚各国进行商贸交易,形成独具特色的山地丝绸之路文化。

**关键词:**丝绸之路;山地之路;广西;东南亚;经贸

**中图分类号:** K 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16)05-0134-06

学术界认为,古丝绸之路主要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远及非洲、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等<sup>[1]</sup>。事实上,除了以上四条丝绸之路外,历史上古代中国还通过广西、云南的陆路进入东南亚,再经东南亚进入欧美,安南等国通过这条路进贡金器、珠宝、象牙、沉香等;中国则通过这条路回赐一些物品,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等;此外中国民间还通过这条路与安南等国交易绫、锦、罗、布等,故可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这条南方丝绸之路,前半段在陆地上,多劈山为路,故亦可称为山地丝绸之路;后半段则通过海上航行,为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路东起中国南方的广西、云南,经东南亚后西至欧美,形成了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文化走廊。但学术界过去关注不够,特别是其前半段山地丝绸之路,学术界少有人关注。本

文拟就此做一探讨,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 一、古代广西山地丝绸之路的 起始时间及其路线

广西山地多,河流小而少,为加强经贸联系和交通,广西人在借助水路交通的同时,不畏艰难险阻,劈山开路,开辟广西对外的山地陆路交通道路。

广西的山地丝绸之路的开创最早可追溯到秦代。秦始皇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派50万秦军,开通了5条进入岭南的道路,并经越城岭和萌渚岭的2条道路进入广西。徐亦亭先生认为,这两条驿道后来不仅成为中国古代进入广西的主要陆路通道,而且是中国古代由中原经广西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陆路<sup>[2]</sup>。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在岭南设桂林、南海、象等郡。其所置象郡管辖范围包括了广西西南部和今天的越南中部、北部,秦王朝通过象郡便可进入今天的东南亚各国。这应是今日广西通往今天东南亚各国最初的山

收稿日期:2016-05-20

基金项目: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中心(桂教科研[2014]14号)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玉时阶,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南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地丝绸之路的雏形。

汉代,马援在征交趾征侧、征贰时,又由合浦“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sup>[1]</sup>,到达交趾。打通了中国内地通往南疆边境交趾的陆路通道,经此路可到今天的东南亚各国。

唐王朝建立后,加强了广西通往交趾的中国境内陆路建设,在广西通往交趾的陆路上修建了20个驿站,从邕州“西南陆行取马援路至灂州二百七十里,又二百四十里至禄州,又二百里至交州,天宝以陆行凡二十驿。”<sup>[2]</sup>据《新唐书》载,经这条驿道,从广西经交趾,“自驩州东二日行,至唐林州安远县,南行经古罗江,二日行至环王国之檀洞江,又四日至朱崖,又经单补镇,二日至环王国城,故汉日南郡地也。自驩州西南三日行,度雾温岭,又二日行至棠州日落县,又经罗伦江及古朗洞之石蜜山,三日行至棠州文阳县。又经黎黎洞,四日行至文单国之算台县,又三日行至文单外城,又一日行至内城,一曰陆真腊,其南水真腊。又南至小海,其南罗越国,又南至大海。”<sup>[3]</sup>即经中国的交趾可分别到当时的环王国(今越南广南)、文单国(今老挝万象东)、陆真腊、水真腊(今柬埔寨)、罗越国(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最远可到天竺,即今天的印度。出广西,由“安南经交趾太平,百余里至峰州;又经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楼县……又八十三里至悦迟顿;又经八平城,八十里至洞澡水;又经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骠国境(今缅甸),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旻城至骠国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千六百里。又西北度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朱羯罗国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六百里。”<sup>[4]</sup>

宋代,交趾独立为国,称安南,广西成为中国南疆边陲,成为中国内地与安南及东南亚国家经贸的重要陆路交通枢纽之一。当时从广西到安南有3条陆路可走。“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南行入其境机榔县,过乌皮、桃花二小江,至滴定江,亦名富良江,凡四日至其国都,乃郭逵师所出也。又自太平寨东南行,过丹特罗江,入其凉州,六日至其国都。若自右江温湖寨入其过则迂矣。”<sup>[5]</sup>(P55)再由安南到占城“陆行半月程”<sup>[6]</sup>。经占城可达文单国(今老挝万象东)、陆真腊、水真腊(今柬埔寨)、罗越国(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这三条陆路交通要道成为古代中国广西通往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山地丝绸之路。

元王朝建立后,随着站赤制度的完善,基本上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为解决占城的叛乱问题,元王朝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借道安南征伐占城。次年,为使道路通畅,“万户李邦宪、刘世英领军开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驿,每一寨一驿屯军三百镇守、巡逻,后又立堡,专提督寨驿公事。”<sup>[7]</sup>为解决安南的问题,元王朝还多次派遣使者经广西到安南,宣传和解释元朝的主张。据覃主元教授考证,元王朝使者出访安南的路线是中原进入广西后,过全州,经灵川、永福、马平、宾州、邕州、江州、思明州、思凌州后进入安南的禄州,再过元朝设置在安南的驿站丘温驿、支陵驿、朝地驿、桥市驿,最后到达安南都城;再由安南到达文单国(今老挝万象东)、陆真腊、水真腊(今柬埔寨)、罗越国(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然后再到欧美。

明清时期,中国和安南的宗属国关系较为稳定,中国通往东南亚的陆路通道主要是利用中国与安南两国的朝贡道路通行。明代,安南到中国的朝贡道路主要有3条。一是从凭祥过镇南关进入安南,经文渊州坡垒驿、脱朗州南新雨村、保禄县、安越县、慈山府、东岸县、嘉林县到安南国都<sup>[8]</sup>。二是从广西龙州入安南,经平而隘、七源州、文兰平茄社、武崖州山经、思农县平地、安越县、慈山府、东岸县、嘉林县,渡富良江到安南国都<sup>[9]</sup>。三是从广西思明府入安南,经禄平州、谅山府、安博洲、耗军峒、凤眼县、慈山府、东岸县、嘉林县,渡富良江到安南国都<sup>[10]</sup>。再由安南到东南亚国家及欧美。

清代广西进入安南的道路方向大致沿袭明代,但对安南进入广西的入关地点仅限为凭祥,所以,从广西凭祥入安南,一是经谅山府、鬼门关,渡昌江、富良江,到安南国都<sup>[11]</sup>。二是经文渊州、谅山府、安州、鬼门关、屯糜、茶山、昌江、市桥,到安南国都<sup>[12]</sup>。三是经文渊州、谅山府、莅仁驿、安州、鬼门关、支陵驿、先丽驿(即屯糜)、保禄县芹营驿(茶山)、寿昌驿、慈山府安悦县市桥驿、嘉林县吕瑰驿到安南国都<sup>[13]</sup>。再由安南到达东南亚国家及欧美。

## 二、山地丝绸之路促进了古代广西与东南亚各国经贸交往

早在汉代,中国就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从中国的交趾到达当时的环王国(今越南广南)、文单国(今老挝)、陆真腊、水真腊(今柬埔寨)、罗越国(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最远还可到天竺,即今天的印

度。东南亚一些藩属国也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到中国朝贡和进行经贸交流。宋代,安南独立之后,除海上丝绸之路外,安南国还派遣使团沿南方山地丝绸之路到中国朝贡,安南“地界毗连两广,向来入贡贸易等事,均由陆路行走”<sup>[13]</sup>。究其原因,正如两广总督李鸿宾所说,安南与“东西两省内地向有陆路交易处所,货物通流,自利借资利用,与外国远隔重洋必须航海载运者情形不同。”<sup>[14]</sup>(P612)所贡方物主要有金器、珠宝、象、犀角、沉香等<sup>[15]</sup>(P59)。占城则以“方物、犀角、象牙来贡”或贡犀角、象牙、龙脑、香药、孔雀、玳瑁等<sup>[16]</sup>。外国使臣到中国京城朝贡后,中国的中央王朝一般都会按其贡品比价的数倍回赐一些物品,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等。如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三月,其(占城)王悉利因陀盘遣使因陀玠李帝婆罗、(副使)白布罗低冬来朝,贡牯犀一株、象牙二株、白氈二十条、哥縵三十五条、绣哥縵一对、亲色哥縵十四合、并杂药物等。王妻波良僕瑁、男茶罗继占谋律秀瓊等又各贡犀角、象牙、龙脑、玳瑁、香药。其进奉使、副(使)又各进奉犀、象、方物。赐衣服、金带、银器、鞍马、被褥、巾履有差。”<sup>[17]</sup>除了中央王朝的回赐外,沿途接贡的中国地方官员也对外国使臣给予赏赐。清代乾隆年间,安南使臣入关时,广西“左江道以花币赏入京进贡夷官,次赏护贡回国夷从,以牛、酒犒夷官、夷从与汉、土官兵。凡进贡夷官、夷从共二十一人。正使陪臣一人,赏镀金银花一对,重二两;大红云缎一端。副使陪臣二人,各赏镀金银花一对,重一两六钱;各大红云缎一端。通事官一人,赏银花一对,重一两二钱,大红云缎半端。行人四人,各赏银牌一面,重八钱,各红布一匹。从人十三人,各赏银牌一面,重五钱;各红布半匹。其护贡之夷官、夷从受赏出关,仍擂鼓放炮,唱开关。”<sup>[18]</sup>

为了促进中国与安南的民间贸易,两国政府在山地丝绸之路的通道上开设了不少贸易关口与市场。清王朝在广西陆路的平而、由隘、水口开关与安南互市<sup>[19]</sup>。安南亦“于谅山镇属之花山地方添设铺店,招徕平而出口之商”<sup>[20]</sup>,最初是在山地丝绸之路的广西平而、水口出关,广西“南宁、太平、镇安三府与夷境接壤,中间以山为界,山之外为安南,山之内为各属土司,而之继续处即为关隘。计三关一百隘口,内惟平而、水口两关许民出入,镇南一关为该国贡道所经”<sup>[21]</sup>(P593)。清乾隆年间,又开放了广西宁明的由村隘,广西宁明由村隘,“在上石西三十里,土名笏竹根,接越南文渊州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安南国王阮光平请开关通市,奉旨允准五十六年

开由隘通商,至安南凉山駟驢市贸易。”<sup>[22]</sup>平而、水口两关来商于高凭镇牧马庸立市,由村隘来商于谅山镇駟驢庸立市<sup>[23]</sup>(P599)。特别是山地丝绸之路中的邕州左江永平寨博易场和漓江栅贸易点,成为重要的民间贸易市场。中国和安南两国的商人、边民时常在这里进行商业贸易。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载:“邕州左江永平寨,与交趾为境……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银、盐、钱与吾商易绫、锦、罗、布而去。凡来永平者,皆峒落交人,遵陆而来,所齎必贵细,惟盐粗重。然盐止可易布尔。以二十五斤为一箩,布以邕州武缘县所产狭幅者……又有漓江栅,与交趾苏茂洲为邻,亦时有少博易”<sup>[24]</sup>(P195)。“交易用唐宋时钱,七十文为一钱,七百文为一贯。”<sup>[25]</sup>

明清时期,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广西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从广西出境的山地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各国经贸交往的重要干道之一。正如两广总督李鸿宾所说:安南“与(中国)东西两省内地向有陆路交易处所,货物通流,自利借资利用,与外国远隔重洋必须航海载运者情形不同。”<sup>[26]</sup>(P612)广西巡抚陈用敷说:“镇南关系安南入贡正道”<sup>[27]</sup>(P599)。安南入贡主要经广西山地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仅康熙十四年(1675年),安南经这条山地丝绸之路朝贡的主要贡物有金香炉、花瓶、银盆、沉香、速香、降真香、白木香、中黑线香、白色土绢、犀角、象牙等<sup>[28]</sup>。此外,中国与安南两国有不少人,甚至连一些朝贡的使臣亦常私带货物,利用这条山地丝绸之路私下进行贸易。明成化年间,因安南“其国朝贡使人多挟私货营利”,明王朝明令“命禁安南国使臣多挟私货”<sup>[29]</sup>。中国的一些官员亦乘机走私。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太平府员札到凉山,内叙例定嗣后详核,内地出口商民腰牌,照江州、龙州两厅印给,是实无牌,即系私越,拿解惩办。”<sup>[30]</sup>(P472)据越南《大南实录》卷59载,清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越南北圻诸省多有清人自称公派越往者,牌票多门,真假难辨。”于是安南重申,应按乾隆年间议定的章程,“内地人民出口贸易,准领明江、龙州两处印照腰牌,取道由村隘行走,本国验照放行。”<sup>[31]</sup>(P463)在这条山地丝绸之路的官道上,除了两国的朝贡贸易外,民间的贸易亦十分活跃,其所交易之物多为米、食盐、布匹、银、铜、铅、锡、丹砂、水银、翡翠、食盐等。中国“内地赴安南贸易,多系广西之南宁、太平、镇安等府及广东之韶州、惠州、□州、嘉应州民人。伊等或系单身,或系合伙,置货出口……”<sup>[32]</sup>(P600)“初时出口商货不过各色油斤纸札,铁锅等项粗重之物”“近则间

有绸、布、茶、香稍为细重之物”<sup>[14]</sup>(P609)。广西“太平极处边徼……趁圩所市,不过布帛米盐……他如银、铜、锡、丹砂、水银、翡翠之属,皆出交趾,非此产也。”<sup>[23]</sup>正如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成林所说:“奴才成林跪奏:再自(乾隆)五十六年仰蒙圣恩准安南通市以来,初时出口商货不过各色油觔及瓦器、纸札、铁锅等项粗重之物。近因该国人民乐利,所需内地物件倍于往时,奴才于往返镇南关途次目击由村隘陆路出口之商货,源源不绝。查其所带各货,间有绸布、茶香稍为细重之物。其平而、水口两关系龙州同知经理,距镇南关稍远,询之该同知王抚棠,亦称近来出口货物较通市之初日渐增多。”<sup>[14]</sup>(P609)

山地丝绸之路开通后,中越两国边民通过山地丝绸之路不断从事边境贸易活动。广西“所属思明、镇安、龙州,与交趾接连,土民贪图微利,潜从小路往来贸易。”<sup>[23]</sup>广西边境“由村隘陆路出口之商货源源不绝……其平而、水口两关,近年出口货物较通市之初日渐加多。”<sup>[14]</sup>(P609)广西明江所管辖之五十三寨中的“无业贫民”亦靠肩挑贩运货物“营生”<sup>[14]</sup>(P596)。“粤西僻在炎暹,山川交错,沿边三关百隘,处处接壤……内地药材、硝磺、绸缎等物,系彼处所必需。内地无籍之徒,带私货越隘口到彼贸易,牟利甚多。”<sup>[14]</sup>(P602-603)据“署理两广总督印务、广东巡抚臣郭世勋跪奏,为安南通市添设花山市场,商民益增踊跃,……据龙州同知王抚棠称,由平而、水口两关出口之客民……询由出口货物,易于销售。又称该国另于谅山镇属之花山地方添设铺店,招徕平而关出口之商,更属便捷等语。”<sup>[14]</sup>(P608)

为了促进经贸活动的发展,一些中国人甚至深入安南内地开店铺经商,进行贸易;或是购买山场,开采矿产。在安南宣光省,“湖广人识金银铜铁器,到处结伙开庸店,鑿甑煮矿。”<sup>[24]</sup>(P473)在安南宣兴,“广西、开化等府与富州土人常以岁八九十月合伙赏银来聚龙各村买木棉粒制作满贮,待腊节担回内地。其来者或五六十人,或百余。”<sup>[24]</sup>(P474)“安南高平、牧马、谅山沿边一带场厂,多有广东潮、嘉等处民人在彼开采。”<sup>[14]</sup>(P601)一些商人和边民甚至铤而走险,进行走私。古代中国一直实行盐业专卖制度,严禁民间走私、买卖食盐。但官盐不仅贵,而且桂西少数民族地区道路崎岖,官盐运输、购买都较困难。故史籍上记载说:“向来广西盐引,因商人无力承办,以致民间有淡食之苦。”<sup>[25]</sup>所以,桂西少数民族地区许多人因缺盐过去都有大脖子病。但“交趾滨海,产盐最多,且无私盐之禁,听夷人自卖。”<sup>[26]</sup>所以,桂西少数民族地

区的边民所食之食盐多靠与安南边民交换得来,这种交易早已有之,正如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凡来永平者,皆峒落交人,遵陆而来,所齎必贵细,惟盐粗重。然盐止可易布尔。以二十五斤为一箩。”<sup>[6]</sup>(P195)清人谢启昆《广西通志》则记载说:广西“镇安府之归顺州及向武、都康等土州,向食交盐”<sup>[25]</sup>。

### 三、古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经贸之路的作用与影响

古代广西山地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沟通了古代广西与东南亚的陆路交通,而且促进了古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交流,推动了民间商业行会的形成,繁荣了边境城镇,促进了边境民族的通婚,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形成了众多的跨境民族。

古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交流,促进了民间商业行会的形成。“平而、水口两关来商于高凭镇牧马庸立市,由村隘来商于谅山镇馱驴庸立市,分设太和、丰盛二号,以粤东商民为一号,粤西及各省商民为一号,仍区别厂市,于厂内置厂长一人,保护一员。市内置市长一人,监当一员,攒造名册,给发腰牌。货物随其所售,物价随其所宜……”<sup>[14]</sup>(P599)安南“亦在其立市之牧马、馱驴等处建设行铺、客房……其应设客长、牙行亦经该州等分别选充,足以专司出口贸易之事,均可无误”<sup>[14]</sup>(P604)。并形成一定的行会制度。据广东广西总督臣马尔泰所奏:“……再由村一隘,据详向系上石西土州地方,今归明江理土同知管理,当年之题定查禁者,原以平而、水口两关既经议开,商民得以出入贸易。殊不知交趾馱驴地方,为各处货物聚集之所,相距由隘不远,径捷利倍,故宁明商贩率多愿从由隘出入贸易。……查宁明州,向置会馆,设立客长,以为由隘出入之公所。似应令该州慎选老诚殷实之人数各充作客长,凡有客货出隘,许客长将客人姓名、籍贯、货物及发往何处,一一注册报明该州查实,给与印票,并于会馆内刊立木榜,不许客长籍端需索……其五十三寨挑夫,亦令该州将姓名、住址造册,并取十人连环保结,一体给与印票。至由村隘口即令理土同知于该隘查明印票,给与腰牌放行。”<sup>[14]</sup>(P592-593)

古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交流,促进了边境城镇的繁荣。随着边民商贩的往来和边境经贸的发展,内地的商人不仅聚集于边境居住经贸,而且设立会馆,建立行会,使边境城镇逐渐出现繁荣。如广西凭祥、隘口两处,因是龙州和安南交通

运输往来必经之路,每逢圩期,均有马车十余辆往来运输货物,资本达三千元的商店有四五家<sup>[7]</sup>。龙州的平而、水口两关开放后,龙州利用其左通镇南关,出凉山;右通牧马,出新街,达于太原的地理优势,吸引国内外的商家前来贸易,在清嘉庆年间就以建有东、南、西、北等 14 条街道,成为“烟户相望,商贾辐辏”的边疆商旅重镇<sup>[28]</sup>。

古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交流,促进了古代中国与东南亚民族的通婚,在中国与安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形成了众多的跨境民族。“查安南高平、牧马、凉山沿边一带场厂,多有广东潮、嘉等处民人在彼开采。历年既久,无异安南土著。”<sup>[14](P601)</sup>“从前在彼置有产业,不愿回籍者,听其自便。”<sup>[14](P593)</sup>“从前在彼已娶有番妇,生有子女,与夷人结有婚媾并庐墓田业,情甘异域者,照例安插彼地为民,永不许其进口。”<sup>[14](P593)</sup>据范宏贵先生调查,中国有壮、汉、傣、布依、苗、瑶、彝、哈尼、拉祜、仡佬、京、回、布朗等 13 个民族跨境而居;而越南有京、岱、侬、泰、赫蒙(苗)、瑶、拉祜、仡佬、占、泐、布依、热依、华(汉)、艾、侃侃、普拉、巴天、由由、哈尼、西拉、贡、布标、拉基、山斋、克木、莽等 26 个民族跨境而居<sup>[29]</sup>。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通过边境经贸活动后跨境而居的。

秦汉以降,古代中国为加强与其南方周边邻国的交通和经贸联系,在借助南方水路交通的同时,不畏艰难险阻,劈山开路,开辟从广西通往东南亚的对外交通陆路,以增强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联系,并利用这条陆路通道与东南亚各国进行商贸交易,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形成了这条山地丝绸之路的独具特色的经济、政治和人文的密切联系。在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中,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不仅具有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意义,而且可以拓展人们的外交视野与外交思维,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综合推进,加速中国与东盟各国自贸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共创 21 世纪丝绸之路的新辉煌。

#### 参考文献:

- [1] 袁新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战略分析[J].理论月刊,2014,(11):5-9.
- [2] 徐亦亭.古代广西对外交通[J].广西民族研究,1991,(3):51-54.
- [3] (宋)范曄.后汉书·马援传(卷 24)[M].北京:中华书局,

1962.838.

- [4] (宋)曾公亮.经武总要前集·广南西路(卷 21)[M].北京:中华书局,1959.579.
- [5] (宋)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下(卷 43)[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52.
- [6]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外国门上(卷 2)[M].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
- [7]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占城[M].嘉庆十五年刻本.
- [8] (明)宋濂.元史·外夷二·安南传(卷 209)[M].北京:中华书局,1976.4644.
- [9] (明)邓钟.安南图志·计开钱氏述古堂钞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7.27.
- [10] (清)吴光.丛书集成续编·使交集(第 125 册)[M].民国 10 年 1921 年刻本.
- [11] (清)李先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安南史事纪要(卷 1)[M].清抄本.
- [12] (清)邹黑.明图,周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使交記事[M].康熙年间刻本.
- [13] 清宣宗实录(卷 272)[M].北京:中华书局,1986.193.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15] (清)谢启昆.广西通志·经政略十四·安南入贡事例(卷 164)[M].同治四年刻本.
- [16] 清高宗实录(卷 226)[M].北京:中华书局,1986.992.
- [17] (清)王炳坤.宁明州志·隘口[M].光绪八年刻本.
- [18] [越]黎崱.安南志略·刑政(卷 14)[M].光绪十一年刻本.
- [19] 李鸿章等.大清会典事例·礼部·朝贡·贡物(卷 503)[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
- [20] 明宪宗实录(卷 176)[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
- [21] 王柏中等.中国西南边疆相关史料辑·大南实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22] (清)甘汝来.太平府志·食货[M].雍正四年刻本.
- [23] 明英宗实录(卷 162)[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3157.
- [24] [越]黎贵淳.见闻小录(第 5 集)[M].阮克淳校.河内:越南教育出版社,2009.
- [25] (清)谢启昆.广西通志经·政略九·盐法一(卷 159)[M].同治四年刻本.
- [26] 清高宗实录(卷 219)[M].北京:中华书局,1985.827.
- [27] 凭祥市志编纂委员会.凭祥市志[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344.
- [28] 马依等.广西航运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100.
- [29] 范宏贵等.中越边境贸易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2-23.

【责任编辑:周琍】

# The Mountainous Silk Road: the Trading Route from Guangxi to Southeast Asia in Ancient Times

YU Shi-jie

(Guangxi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06)

**Abstract:** Academics believe there are four major silk roads in ancient China. They are “the Northeast Silk Road”, “the Silk Road through Prairies”, “the Southwest Silk Road”,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part from these four silk roads, in order to have more communication and closer economic tie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on the south via waterways, people in ancient China carved roads through mountains and thus opened land routes from Guangxi to Southeast Asia so as to have closer political ties with countries in that region. People opened trading posts and markets on this silk road in mountains. They used this land route to have commercial transaction with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created unique silk road culture.

**Key words:** silk road; mountainous silk road; Guangxi; Southeast Asia; trade

---

【上接第 133 页】

##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Traitor's Property

FENG Bing

(College of Marx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Abstract:** The term “*nichan* (the traitor's property)” was first explicitly put forward and used in Ming Dynasty, while its origin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operty of people convicted of treaso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Ming Dynasty, people in Qing Dynasty used “*nichan*” to refer to rebels' property. Confiscation of a rebel's property became an ordinance then. From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o the Anti-Japanese War, “*nichan*” referred to the property of traitorous warlord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corrupt officials, local tyrants and evil gent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nichan*” mainly referred to the property of hanjian (people working for Japanese invaders).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and the early days of the new China, “*nichan*” was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Old “*nichan*” were the property of hanjian, and new “*nichan*” referred to the property of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counterrevolutionaries, local despots, leading agents and so on. Governments of all ages used the definition and disposition of “*nichan*” a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regime surviva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and used their own political needs as the basi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nichan*”.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disposition and use of “*nichan*” evolved with time as society develops and people's legal awareness is strengthened. Progress in this regard is reflected in the elimination of unreasonable elements in confiscation system, the introduction of legal sense, and stronger human rights awareness. “*Nichan*” was no longer monopolized by royals, but increasingly taken for public use. Instead of being confiscated by military and government, much more “*nichan*” is now used for public welfare.

**Key words:** the traitor's property; political groups; hostile forces; punishment